



爱泼斯坦眼中的毛泽东

从中国实际出发探寻革命道路

□ 史泽源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对解放区实行新闻封锁、进行舆论抹黑，国内外严重缺乏对“红色中国”的真实了解。在此背景下，1944年夏，爱泼斯坦以中外记者参观团的身份，由重庆，经西安，到达延安。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爱泼斯坦深切感受到，同一国度内国共两党的统治区竟有着天壤之别，并认为中国的未来一定是红色的。深深打动爱泼斯坦的不仅是军民一家的民主氛围，自力更生的大生产运动，更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数十年后，爱泼斯坦在回忆录中浓墨重彩地介绍了1944年的延安见闻，而使他久久难以忘怀的便是中共领袖的群像，其中使他印象最为深刻的当属毛泽东，“我在延安访问过的中共领导人中，最杰出的无疑是毛泽东”。

“个人作风是平易近人、十分简朴的”

“个人作风是平易近人、十分简朴的”是毛泽东留给爱泼斯坦的第一印象。在访问延安前，爱泼斯坦可能设想过初见毛泽东时的场景，但真正见到毛泽东后，他还是为这名中共领袖和整个中共领导层的简朴所震撼。记者团首次采访毛泽东的地点被安排在了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大会议室。在这个出台过一系列决定中共命运、民族前途的会议室里，竟无一件值得称道的办公物品，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悬挂着的孙中山、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画像，以及毛泽东本人。

在延安期间，爱泼斯坦发现毛泽东平易近人的特点表现在他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生活中，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高级领导干部，并没有进行过多不必要的限制。在延安遍地黄土的大街上，人们经常

可以看到毛泽东在不带警卫的情况下，同老百姓们进行亲切深入的交谈。在人们合影时，毛泽东既不站在中间，也没有人引导他站在中间，他可以站在任何地方，有时在边上，有时就站在别人身后。在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一起用餐时，大家散坐在两三张小方桌旁，谈话很方便，食物也极简单。当毛泽东听闻记者团即将离开延安时，毛泽东专门与两位同事一同到爱泼斯坦居住的窑洞招待所来道别，并赠送了延安石印的带有毛泽东亲笔签名的照片。这令爱泼斯坦大为感动，一直珍藏至其生命的最后一刻。

毛泽东在工作中也处处彰显着他平易近人的风范。如在记者团采访毛泽东的活动中，不仅有毛泽东向记者团作报告，回答记者提问，还安排了单独谈话环节。爱泼斯坦发现，毛泽东在接受单独访问时，他非但不设时间限制，甚至有时会连续好几个小时。毛泽东既接受记者的提问，也喜欢“反客为主”，对记者提出问题，“向他的采访者提问他们所知道的和心里所想的事情，以扩大和检验他的知识面”。这样无拘无束地采访政党最高领袖的方式，无论对于哪一个记者来说，都是少有的。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待人诚恳、热情的工作作风。

“在展望发生在中国未来的事件时很准确”

在爱泼斯坦眼中，毛泽东是一位拥有先见之明的伟大领袖，“在展望发生在中国未来的事件时很准确”。如在全民族抗战初期，毛泽东便成功预见到将有三个战略阶段，并对中国军队应在各阶段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战术进行了科学研判。这

些理念为中国军民指明了胜利的道路。又如，在即将迎来抗战胜利曙光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创造性提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的建国方案，为渴望和平的中国人民指出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在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特别是毛泽东的个人经历后，爱泼斯坦发现毛泽东之所以能对革命形势作出准确判断，源于他善于做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1927年初，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面临着国共分裂的巨大风险，毛泽东通过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找到了中国革命可靠的同盟军。爱泼斯坦还发现，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形成了深思熟虑的性格特点，他高度关注中国现实状况，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当党内热衷于谈论罗马、希腊、德国、法国和苏联的文化，而置中国革命的特点于不顾时，毛泽东却始终没有忘记中国的独特国情，即中国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大城市之外。为此，毛泽东要求党员干部深入到农村中去向人民大众学习，从中国实际出发探寻中国革命道路。在革命面对重大风险挑战时，毛泽东十分强调坚持原则。在中日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后，无论是在处理西安事变的过程中，还是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与武力挑衅，毛泽东都强调从民族大义出发，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坚决避免中国内部的全面冲突，尽可能地团结抗战力量，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延安是中国未来的缩影”

毛泽东在异常繁重工作中表现出来的从容不迫的状态，给爱泼斯坦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毛泽东每

天不仅要处理事务性工作，还要进行理论创作；既要避免发生内战，又要促使国民党更好地对日作战。然而在如此重压之下，记者们却普遍感觉毛泽东在工作生活中“好整以暇”“举重若轻”。这同国民党首脑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重庆，蒋介石总是在摆架子，显得不自然、神经质、紧张，说话哼哼哈哈”。他在信中告知了自己的妻子邱茉莉：“我已经实实在在地深信，延安是中国未来的缩影，在下一个十年里将证明这一点。”

毛泽东知人善任的特点也让人赞不绝口。当时凡是关注国民党上层政治的人，都对蒋介石在用人上迟疑、死板的风格略知一二。“蒋经常没有必要地过问过多的繁琐事务，事后批评他的指挥官做的大小每一件事。”相反，毛泽东则真正做到了用人不疑，给予高级将领充分的处置权。特别是在各根据地交通不畅、战争形势瞬息万变的情况下，毛泽东既要求八路军将领严格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又赋予他们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具体指示的权力，将一致性和灵活性充分地结合在一起，自主探索符合实际的抗战方式。

毛泽东出神入化的语言表达艺术令人折服。毛泽东在使用极简单的方式作宣传时，不仅可以准确表达关键信息，还能使内容增色不少，让人印象深刻。比如，毛泽东曾以“抓跳蚤”为例，向部队说明灵活性和主动性在作战中的极端重要性。“愚蠢的敌人用十个手指来按住十个跳蚤（比喻解放军的小股部队），然后我们的主力部队就可以一个一个地把敌人的‘手指’砍掉。”从类似脍炙人口的讲述中，爱泼斯坦深切地感受到毛泽东的思维是多么活跃，对实际的理解又是多么深刻，从而更加坚定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念。



吉林义士王希天君纪念碑暨温州旅日蒙难华工纪念碑，位于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五马街道华盖山东北侧半山腰，始建于1926年。石碑由青石构成，八边形底座，碑高约2米，宽0.3米，碑上部设覆莲顶。东北方向阴刻隶书：吉林义士王希天君纪念碑；西南方向阴刻隶书：温州旅日蒙难华工纪念碑。1993年浙江省温州市政协与市对外友好协会负责在原址重建纪念碑，并撰《吉林义士王希天君纪念碑 温州旅日蒙难华工纪念碑碑记》，镌刻于纪念碑一侧的碑面墙上，全文如下：

王希天烈士（一八九六——一九二三），吉林省长春市人。一九一五年留学日本，目睹我温处两地数千旅日劳工艰难困厄之状，遂以维护华工权益为己任，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发起成立侨日中华劳动同胞共济会，被推为会长。举凡排难解纷，扶危济困，奔走交涉，诸事必躬亲之。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东京大地震，继以大火，谣言四起，暴徒藉机虐杀华工。我温处籍罹难同胞计达六百余众。烈士为救护华工，竟被日军暗害于江东区龟户町逆井桥。惨案发生，良知震怒，家乡父老，莫不泣然。日本当局竭力掩盖真相，北洋政府又复昏庸无能，终未能捉伐凶肇，滴雪沉冤。我温士人缅怀烈士义薄云天，惠泽瓠括，乃于一九二六年元月建吉林义士王希天君纪念碑，于华盖山大观亭之侧，以资景仰。一九四四年侵华日军占据温州时毁之，仅留残石。一九七四年，国务院批准追认王希天为革命烈士。一九九一年日本友人仁木富美子将华工罹难真相公之于世，继发起成立日本悼念王希天及旅日蒙难华工委员会。捐资重树崇碑，俾烈士之亮节永垂，六百余罹难华工魂归有所。中华扶桑一衣带水，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兹立此碑明史实，以告慰逝者，昭后人以永固友好好是铭。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温州市委员会
中国浙江省温州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公元一九九三年九月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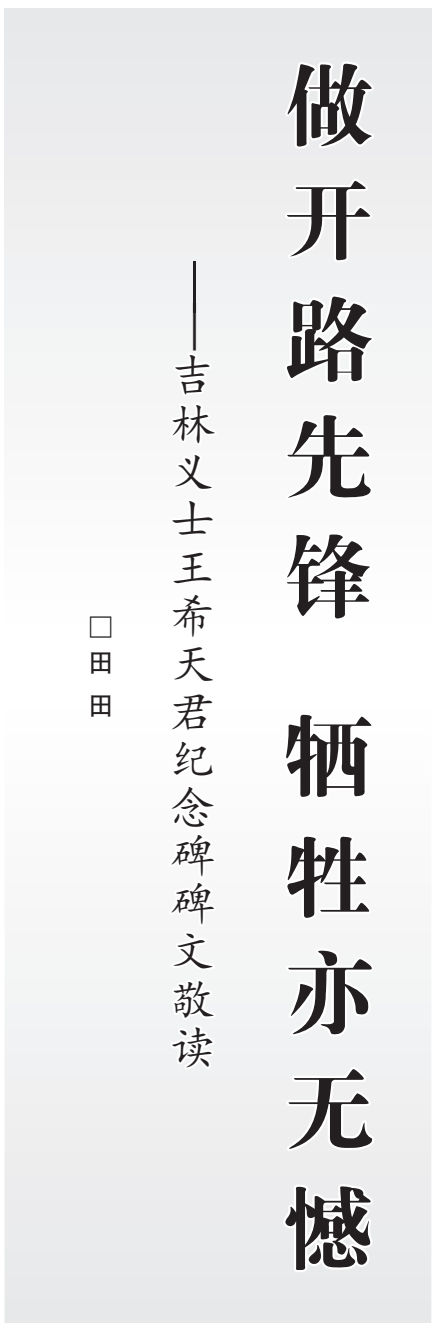
碑文交代了发起成立侨日中华劳动同胞共济会的背景，揭露了数百华工以及王希天惨遭日军杀害的历史真相，展现了王希天一生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坚毅与执着。革命烈士之浩然正气，往来成古今，读罢泪沾襟。

（一）

1915年，王希天怀着救国救民的宏愿，东渡日本求学以报效祖国。正因“以为祖国”为己任，王希天针对留学生界存在的弊端，提出青年应誓以身作则，做开路先锋，警示留学生要明确人生的奋斗目标，奉献祖国不辱使命。

1918年，日本帝国主义继向中国政府逼签“二十一条”卖国协定之后，与段祺瑞政府秘密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国留日学生获悉日本政府的侵略阴谋与段祺瑞政府的卖国行径，立即在王希天等人倡议下开始共谋反抗密约的行动，史称“拒约运动”，这也成为五四运动的前奏。1918年4月，在留日学生集会上王希天誓死力争取消亡国苛约，并号召留日学生团结起来共谋救国方略。随后，他与周恩来等人发起留日学生救国团，并召开日本反华罪行声讨会，遭到日警百余人包围并被拘捕，幽禁于警署一天一夜后才获释。

爱国的“拒约运动”持续半年之久，一年后王希天在东京又组织中国留日学生发起大规模声援五四运动的斗争。国内爆发五四运动当天，他以留日学生救国团的名义，要求政府拒签巴黎和约以保山东主权。5月7日，王希天亲赴日本外务省交涉，营救出呼吁拒签和约而被日本军警逮捕的东京留日爱国学



——吉林义士王希天君纪念碑碑文敬读

□ 田田

生。因声援五四运动所展现出的强烈爱国心和非凡领导力，王希天被日本当局列为“煽动骚乱”的排日分子，并对他进行严密监控。

（二）

1921年，王希天投身到为华工服务和斗争的革命活动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浙江温州、处州地区大量山民赴日充当劳力，深受日本人歧视剥削甚至遭受辱骂殴打，生活窘困卑微。为保障侨日华工的正当权益，王希天深入华工之中，与日本政府和资本家迫害华工的种种罪行进行顽强的斗争。

1922年9月，王希天创建侨日中华劳动同胞共济会，并当选为会长。共济会设立医疗部和药局，为华工提供巡回医疗；设立教育部，为华工补习文化知识；设立慰问部，了解华工疾苦并及时帮扶。王希天领导的华工维权斗争在日本社会产生了强烈反响，有效遏制了资本家、工头虐待欺辱华工的行为。他也因此被日本工头和反华势力视为“排日巨魁”“社会主义者”而怀恨在心。

1923年9月，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排外气氛愈演愈烈，仇华分子乘机大肆杀害华工。王希天心急如焚，急切地与好友商量救济华工的办法，不顾东京戒严交通暂停的险境，冒着生命危险，骑自行车寻访华工下落，更欲揭露日本军警虐杀华工的暴行。日本当局唯恐罪行被曝光，即将王希天拘捕关押。12日凌晨，王希天突然被押出警署，途经逆井桥头时，突然被事先奉命隐藏在暗处的日本军警从背后用刀劈下，身首分离，将尸体抛入桥下河流中。王希天壮烈牺牲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屠刀下，年仅27岁。面对中国官方和民间彻查王希天“失踪”案的要求，日本政府却一直极力掩盖事实真相，致使王希天血案尘封了数十年。

（三）

同为赴日留学生的王希天与周恩来有着志同道合的深厚革命情谊。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多次寻找王希天的遗属。1961年，周恩来回忆在日本时与王希天结为好友，高度赞扬他有强烈的爱国心。1962年周恩来在百忙中接见了王希天的遗属，肯定王希天是有抱负的爱国知识分子。

1973年，周恩来授意国务院办公厅致函中共长春市委：“王希天确是1923年在日本为革命牺牲……死时很英勇。王希天的家属应按烈士待遇”。1974年1月，吉林省正式追认王希天为革命烈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向家属颁发了荣誉证书，英灵终得告慰。

抗战期间党如何打开国际传播新局面

□ 谢煜桐

抗日战争时期，以国共合作为契机，我们党在国际传播上艰难起步，逐渐破局，不断成熟，打开了国际传播崭新局面。国际传播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我们党走向成熟的步伐。

艰难的起步阶段。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对共产党进行了长期的军事封锁和新闻封锁，使得革命根据地以外的民众很难了解到根据地内的实际情况。不仅如此，国民党还长期对我们党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进行污蔑，误导国内外民众。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接着，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就为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党在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和方针之后，很快掌握了政治上和精神上的主动，也逐步开始掌握国际传播的主动权。先是在1936年6月至10月间毛泽东成功接待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来访，后者写出传世名篇《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书名为《西行漫记》），出版后很快风靡西方，对于抗战初期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发挥了极大作用。随后，党又按照既定方针，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全面抗战爆发后，党积极主动与国民党沟通，促使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于1937年9月22日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

表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中共中央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线的形成，这就为中国共产党通过公开渠道向国际社会宣传自己的抗日救国主张提供了可能。至此，党迈出了抗战时期国际传播艰难的第一步。

建立宣传阵地。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对外宣传和国际传播是在国共合作大的政治背景下进行的。经过反复协商，国民党同意共产党在国统区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全民族抗战期间，我党先后在上海、南京、武汉、长沙、桂林、重庆、河南林县、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在贵阳设立八路军交通站。党除了把这些办事处、交通站用来执行军事协调任务外，还充分利用这些合法立足之地进行对外宣传。特别是先后设立在国统区建立八路军办事处、武汉、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通过举行记者招待会、登门拜访等活动与各国驻华使节广交朋友，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方针政策及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业绩，增进国际社会对于我党我军的了解和同情。除此之外，党还与英国驻华大使和香港总督协商，在香港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向港澳及南洋各地人民广泛宣传我们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八路军、新四军抵抗日寇的英勇事迹。据此，我们党打破了国民党对于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的新闻封锁。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时创立了我们党第一个对外宣传机构——国际宣传组，主要编译国际宣传资料；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时增设了“国际问题研

究室”，开展对外宣传决策的研究。此外，经过据理力争，国民党勉强应允我们党在国统区发行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作为党在国统区的公开合法阵地，这些报刊也是及时而直接地向国统区的外国人并通过他们向世界人民宣传我们党的重要渠道和平台。

争取国际友人和爱国华侨到边区参观。为了批驳敌人的造谣污蔑，我们党争取国际友人和爱国华侨到延安和各根据地参观。党中央于1937年在延安筹建了一个专门负责对外联络宣传的交际处，通过接待一批批来延安参观考察的团体和个人，把边区的情况向全世界宣传出去，获得了海外华侨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了解、同情和支持。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就是通过实地到延安的考察，对我们党由怀疑转为信任、同情，并得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结论，是我们党在国际传播方面“争取过来，宣传出去”的一个典范。1944年6月，延安交际处接待了中外记者参观团，其中有代表美联社、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冈瑟·斯坦因，美国时代杂志社、《纽约时报》的爱泼斯坦，美国合众社、《泰晤士报》的福尔曼等著名记者。参观团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全面考察，回国后用详实的材料大力宣传延安和解放区欣欣向荣的面貌和八路军、新四军的伟大战绩，用雄辩的事实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希望之所在。这些外国记者对我们党的宣传取得了国际传播效果。

走上国际讲坛。派代表到国际讲坛直接宣传，是国际传播的一个

十分有效的途径。1938年2月11日，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讨论全世界抵制日货及援助中国的方法和步骤。我们党经过与国民党交涉，获得出席大会的代表名额，派吴玉章为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在大会上作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新阶段》的报告，宣传我八路军、新四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

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在抗战接近胜利之时，即使国民党想封锁我们党的声音，想遏制我们党前进，也已经是力不从心了。标志性的事件是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胜利，同盟国的领袖们在考虑重建未来世界的秩序，成立一个崭新的国际组织——联合国的时候，国民政府最初是企图包办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中国代表团的，这理所应当遭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一致反对，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国民政府也不得不给我们党一个参加大会的代表名额。我们党派南方局主要领导人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代表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参与《联合国宪章》的起草，并在宪章上签字。在美国期间，董必武在华侨举办的演讲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的长篇演讲，系统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主张。他还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在美国筹划出版了用英文印刷的《中国解放区实录》，全面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取得的伟大成就。董必武在美国期间的上述工作，增进了国外华侨和世界各国友好人士对于我们党的了解、同情和支持，是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党在国际舞台上的一次成功亮相。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